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BEIJING SHIFAN DAXUE SHIXUE WENKU

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动： 中国近代史论

郑师渠 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动:中国近代史论/郑师渠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
ISBN 7-100-05018-9

I. 社… II. 郑… III.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0.7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637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SHÉHUI DE ZHUÀNXÍNG YŪ WÉNHUÀ DE BIÀNDÒNG,
ZHŌNGGUÓ JĪNDAISHĪLŪN

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动:中国近代史论

郑师渠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5018-9/K·934

2006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 22.00 元



郑师襄 历史学博士。1946年生,福建省福州市闽安镇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等。已出版学术著作:《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史》(主编)、《中国文化通史》(10卷本,主编)等,并发表有一批学术论文。

《先秦社会思想探研》

晁福林 著

《秦汉社会史论考》

王子今 著

《宋代特殊群体研究》

游彪 著

《明清宫廷藏书研究》

张升 著

《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动:中国近代史论》

郑师渠 著

《晚清理学研究》

史革新 著

《晚清政治新论》

王开玺 著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

李帆 著

《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

张皓 著

《德意志中古史——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

侯树栋 著

《从旧帝国到新帝国——1783—1815年英帝国研究》

郭家宏 著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主 任：郑师渠 晁福林

副主任：杨共乐 李 帆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东平 宁 欣 汝企和

李梅田 张 皓 张建华 侯树栋 耿向东

郭家宏 梅雪芹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总序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高校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1912年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28年单独设系。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合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师资力量与综合实力，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百年的演进历程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庚、赵光贤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耘。经几代人的努力开拓，北师大历史学系学术积累丰厚，学风严谨，久已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镇，学科门类大体齐备，师资力量较为雄厚，既有国内外知名的老教授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又有一批崭露才华并在国内外史学界颇具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在教学方面，我系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重大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我系众多教师参与编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

2 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动：中国近代史论

史学的压轴之作”。其他教师的学术论著也多次荣膺国内外各类学术奖项，得到学界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业已铸就自己的辉煌，但学术的发展无止境。今天，中国社会政通人和，学术研究也日新月异，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更好地传承先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光大其传统，进一步推动学科与学术的发展，本系决定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陆续出版我系学者的学术论著，以集中展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整体学术水准。同时，相信这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向以奖掖学术、传播文化著称，此次《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的编辑出版，也承蒙其大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自序

本书集结的十七篇文章，是从我历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的。这些文章，从时间上看，多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内容上看，多是涉及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方面的选题。这种特点，与其间我国学术发展大势的变动、个人的经历以及自己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学科建设的发展，是相吻合的。

“文革”结束后，1977年高校才开始恢复招生，并逐步走上了正轨。与此相应，我虽于1970年毕业后留校，但得以真正参与教学、科研，步入学术殿堂，也要晚到1977年之后。又过十年，我有幸师从龚书铎教授，攻读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学术生涯自然愈趋正途。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迎来了春天。中国近代史学科同样大得发舒，原来受“左”的思想影响，简单囿于政治史、而且主要是反帝反封建斗争史的中国近代史传统的学科格局，终于被打破了。长期沉寂的文化史研究，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并逐渐升温。1983年，教研室决定将原来设定的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方向，改为近代文化史研究，并重新做了人员分工。这就是何以自己在发表过一些不多的政治史论之后，改而主要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缘由了。1997年后，到学校工作，行政管理的责任占去了自己绝大多数的时间，这又是后

来成果明显减少的苦衷。但所幸无论多忙，学术研究不敢懈怠，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也一直在进行。

当年进入近代史教研室，是服从组织分配。后来慢慢自觉，深感这是十分幸运的事情。近代中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一个过渡时代。近代社会急剧转型，时代风云变幻，波谲云诡；思潮跌宕，洪波涌起。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又有多少风流人物继起，演彪炳千秋的历史话剧。应当说，研究这段历史，有几点格外吸引人。近代史是我们的昨天，它与今天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息息相通。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有些是近代历史发展的直接结果；有些则可能是近代先人业已讨论过的未竟课题，诸如中西文化关系、现代化等等。古人说“殷鉴不远，在夏侯之世”。又说“寂然凝思，思接千载”。近代史近在咫尺，似伸手可及。研究这段历史，自然兴味无穷。此其一。近代史与今天的关联如此密切，由是又生两大佳处：一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解与感悟，往往大有助于对近代历史问题的“理解的同情”和可能催发新想，发现新的研究选题。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直接推动了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复兴，已说明了这一点。二是研究近代史也有助于深化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毛主席强调指导中国革命的政党，要具备三个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知识与国情，并主张集中力量分门别类地研究近百年中国历史，正是反映了这一点。此外，我在学校工作，也深感近代史研究的学科背景，对于自己考虑问题，促进工作，受益匪浅。例如，高师院校与教师教育的改革，是新时期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要回答这一问题，仅有教育理论显然是不够的，它还必须了解自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与创设师范馆以来，百多年中国教师教育的历史与国情，才易于

说清楚。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前后,我提出了中国传统高师转型的构想,先后发表了《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北京师范大学转型与中国高师的走向》、《高师院校范式的更新与转型》等文。有人告诉我,北京市教委主要负责同志曾提到,看过很多谈高师改革的文章,北师大老郑讲得最清楚。我想,自己未必讲得最清楚,但人们所以觉得还有点说服力,那显然是因为得益于以史为鉴与历史感。上述两点,“述往事,思来者”,固然是历史学科的通例,我只是想强调近代历史研究在这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现实性意义与更为突出的魅力罢了。当然,在“左”的年代,或对于“左”仍心存余悸者来说,近代史研究还有“更转进一层”的“优点”:既接近现实,又毕竟不同于现代史,与现实政治存在一段时间差。“距离是美”。它有助于淡化问题的敏感性,无形中起了一种自然保护的作用。特别在初参加工作的时候,自己对于这一点同样是看重的。此其二。近代历史距今不过百余年,且因欧风美雨沛然莫之能御,故社会日趋开放,现代传媒渐次发达,不仅有现代的出版业,而且更有现代的报刊杂志。这些复决定了近代史研究赖以进行的历史资料十分丰富,远较古代史为优越。这自然又是十分诱人的。此其三。这些都是有利的客观条件,只要个人努力,研究者是可以做出成绩来的。不过,说来惭愧,自己至今却还谈不上做出了多少成绩。

这本小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涉及近代社会思潮、学派与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论道光朝的河政》等少数几篇,涉及政治史范围,是个例外。文章发表的时间前后相去甚远。早年写的东西,今天再看,多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为反映走过的足迹,现在也收在一起了。其中《中国近代史研究四十年》,是与龚书铎老师合作的。

4 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动：中国近代史论

这些文章除了个别有少许文字改动外，都保持原样。

著 者

2005年8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自序	1
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1
一、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1
二、从“保教”、“存学”到“东方化”	5
三、“吾人之天职在实现吾人之理想生活”	15
四、文化民族主义：一柄双刃剑	21
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反封建主义	24
一、洪秀全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24
二、维新派超越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	29
三、孙中山革命派开创了正规意义上的新时代	32
四、不应苛求古人	37
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39
一、“西方的没落”与世界文化的对话	39
二、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	49
三、“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再认识	62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71
一、“十教授宣言”	71

ii 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动：中国近代史论

二、“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对立	74
三、一场远离真理的纷争	80
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	85
一、国粹、国学、国魂	85
二、“古学复兴，此其时矣”	91
三、“不类方更为荣，非耻之分也”	96
四、国粹派文化观的历史地位	102
学衡派的文化观	107
一、学衡派文化观运思的理路	107
二、“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	112
三、“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文化，一方面不忘 本来民族之地位”	127
四、学衡派文化思考的得失	138
晚清国粹派论孔子	143
一、孔子是人；不是神	143
二、真孔子与假孔子	146
三、孔子评议	149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铺垫	154
晚清国粹派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探讨	156
一、将儒学归入诸子学研究	156
二、系统探讨古代学术变迁的大势	159
三、实事求是论清学	167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	173
一、反省现代性：一个新的思想支点	173
二、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求同存异	182
三、殊途同归：归趋“整理国故运动”	195
四、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失自己独立的地位	206
梁启超的爱国论	212
一、从《说群》到《爱国论》	212
二、爱国与救国	219
三、爱国与“国民之自觉”	226
四、梁启超爱国论的特色与现代意义	240
刘师培的史学思想	243
一、通史致用：藉史助益革命	243
二、刘师培的新史学主张	248
三、刘师培新史学著作的价值	257
新人文主义与胡先骕的教育思想	262
一、胡先骕与新人文主义	262
二、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思想	266
三、改造中国教育体制的构想	271
四、胡先骕教育思想之局限。	274
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学改革思想	276
一、历史教学改革应当服务于历史教育总的目的	276
二、“这件事情，关系历史系课程改革，甚为重要”	281
三、讲究教学方法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287

四、白先生教学改革思想的历史考察	293
道光朝 的河政	296
一、“蓄清敌黄，渐复旧规，照常济运”政策的破产	296
二、“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	300
三、河政敝坏的严重后果	305
道光朝 的漕政	311
一、漕弊积重难返	311
二、经世派与海运	315
三、畿辅屯田与改征折色之议	319
四、漕弊加剧了道光朝统治危机	322
张佩纶与马尾海战	327
一、清流健将	327
二、马尾海战失败的检讨	330
三、张佩纶难逃其咎	335
四、马尾海战与张佩纶的人生悲剧	339
中国近代史研究四十年	341
一、“十七年”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341
二、十年“文革”的曲折	358
三、新时期的新生面	360
四、几点思考	376

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关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者不乏其人;但对于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迄今却未见有专文论述。据笔者所知,美国的费正清教授是最早注意到这一历史现象的外国人,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①。这是极具见地的。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深层的民族主义,它影响着近代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研究这一历史现象不仅是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今发展民族新文化也有现实意义。

一、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何为民族主义?众说不一,但以下的三种说法值得重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民族主义可以表明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盖尔纳以为,“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文化功能”^②;古奇表述得最具体,他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

^① 《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4页。

^② F. 盖尔纳:《今天的民族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

的或实际存在的)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实现、维持与延续该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力的欲求结合在一起。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心态,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况,它包含着本民族优越于其它民族的信仰”^①。笔者以为据此可作以下界定:民族主义是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要求在政治与文化合一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认同与发展的一种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其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挚爱。

民族主义是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概念和运动。民族国家的观念是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全民族”代表自居,先后颠覆了神权与君权,使人由原先的宗教信徒、王朝臣民变成了“民权国家”的公民之后才出现的。与此同时,以对民族国家即“祖国”的忠诚为基础的民族主义随之而起,故人谓“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法国大革命后的约一个世纪,是西方民族主义凯歌猛进的时代。

民族主义有两种范式: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在18世纪的欧洲,当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启蒙运动造就了本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时,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和纷争割据的局面,没有勇气通过激烈的反封建斗争去实现民族的统一,而是转而试图借助文化认同去达到既定目标,以抵拒法国文化的入侵,由是兴起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从普遍的意义上说,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

^① G. P. 古奇:《民族主义》,转引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3年5月油印本。